

戏曲影剧

慈禧看京剧

慈禧太后是非常喜欢京剧的，但是她属“羊”，看戏时最忌讳提到“羊”字。到宫里给她唱戏的京剧演员，不能唱《变羊记》、《牧羊圈》这一类名字的戏。如果戏词有“羊”字就得改。比如，玉堂春原词是：“苏三此去好有一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著名武老生王福寿在外边跟人合伙开了个“羊肉铺”，便犯忌了，慈禧从此再不赏他银子。她吩咐下边：“不许给王四（王福寿）赏钱，他天天刷我，我还赏他？”

慈禧爱看京剧，却从来不把演员当回事，还百般拿演员寻开心。一次郎德山饰演《金钱豹》里的猪八戒，她明知道郎德山是回民，却让他学猪叫。郎德山一听，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我偏不学猪叫，我学羊叫，也拿你开心。郎德山豁出去了。没想到一声羊叫反倒把慈禧逗乐了。有一次宫里演《翠屏山》，演员正唱着呢，慈禧突然下令停戏，让人把戏提调叫来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戏提调挨了骂莫名其妙，不知什么地方犯了忌，后来向人请教，才知道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当着太后的面唱这一句，挨一顿骂还算轻的呢！

有一年二月二，清宫里耍龙灯，著名武生杨小楼耍珠子，不

慎把戏台角上的檀香木架子撞倒了，人皆大惊。这惊驾的罪过可不轻啊！慈禧立即传杨小楼，杨小楼赶忙跪倒领罪。慈禧开口就问：“三元（杨小楼的小名，慈禧从来都叫演员的小名）你今儿是怎么了？”杨小楼连忙答道：“奴才今儿个唱了四出《挑滑车》，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才无心惊了驾。”慈禧听完说：“真难为你了，今后不许应这么多活，赏你二十两银了，回去休息吧！”

接着耍珠子的李寿山一想：这倒不错，不加罪反加钱，我也来一下子。耍着耍着照样把台角的架子撞倒了，人们又一惊，龙灯一停，李寿山被带到慈禧面前，慈禧面带怒气问：“李七，你怎么了？”李寿山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慈禧说：“你是看三元得了赏，也想试试？你是存心哪。来呀，传竿子！”竿子就是灌了铅的竹竿，分量重，打在身上特别疼；李赶快求饶。慈禧怒气稍消了些说：“免去竿子，罚俸两个月！”不料李寿山听罢，反倒赶忙央求道：“老佛爷还是打吧！”慈禧奇怪了：“你怎么又要挨打了？”李寿山说：“挨打我倒有俸，这一罚，这两个月我全家吃什么呀？请老佛爷还是赐打吧！”慈禧乐了，说，“下去吧，再犯我可饶不了你！”

北京的戏院和名伶

戏院在清朝最早叫茶园，那时听戏只收茶资，不卖戏票；到民国时代改称剧场、剧院或戏院。

前门大街路东广和楼是北京外城最早的戏院。京剧科班喜（富）连城社，从1900年起长期在这里演出。每次演出前，常有许多观众在门口看着那些穿青衣戴小帽的科班学生排着队来演出，有的还能叫出队伍里演员的名字：“袁世海”、“李世芳”……小演员演得很认真，观众看着也高兴。那时演戏没有海报，常常白天把道具摆在门口，让群众知道今儿晚上演什么剧目。戏院的设备很陈旧，最初楼下的座位都是长条桌子、大长板凳，竖向舞台放置，看戏的人坐下后得侧着身子看戏，两廊的散座则是横着放的长凳。1914年以后才改成横排靠背长椅，椅背后钉着带框的木板，可以放茶碗。

在前门大街西侧繁华的大栅栏里有过5座戏院。最西头邻近观音寺路北的戏院叫做广德楼，它和大栅栏中间路南的三庆园都是类似广和楼那样的老戏院。著名演员程长庚、余三胜、梅巧玲、汪桂芬等曾在广德楼演出；谭鑫培、路三宝、贾洪林、余玉琴等曾在三庆园演出。后来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也在三庆园长期演出。在大栅栏中间路门框胡同里有一个小型戏院叫同乐轩，它建于1909年，座位只有七八百个，无法演出大型剧目，

故经常演出些曲艺杂技，后来改为同乐电影院。在大栅栏东口路北的庆乐戏院，创建于 1909 年，影响超过上述三个。河北梆子名伶杨韵谱和李连云就在这里演出了《茶花女》、《血海深仇》等新戏，名噪一时。1939 年以后，李万春组织的鸣春社在这里演出机关布景戏《天河配》、《济公传》等，舞台上灯光变幻，使观众耳目一新，上座率很高。李万春还从上海请来武生演员，在这里演出火爆非凡的《三本铁公鸡》等武戏，自始至终一直开打，最后由李洪春演出《走麦城》等红生戏作大轴，吸引了很多观众。

在大栅栏东口路南粮食店内还有一家中和戏院，也创建于清末，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长期在这里演出；1938 年尚小云创建荣春社后，也长期在这里演出。1931 年 9 月 18 日晚上艺术大师梅兰芳在这里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峰》，张学良将军出席观看。戏演到半截，副官来到张学良将军身边耳语；张学良神色紧张，匆匆退席。当时梅兰芳也觉察到台下观众忽然走了一片，不知何故；第二天看报才知道是夜里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在大栅栏对过鲜鱼口内有一座北京有名的戏院，兴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叫“天乐茶园”，后来改名华乐园、华乐戏院。著名京剧演员杨小楼、郝寿臣、高庆奎、尚小云、金少山、马连良、张君秋、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言菊朋等都在这里演唱过。1930 年，富连成科班一度在此演夜戏；1936 年富连成科班退出广和楼，只在这里唱日戏，上座始终不衰。1942 年华乐戏院隔壁的长春堂药铺失火，延及华乐戏院，烧掉了富连成科班的全部布景和戏装，该院遭受严重损失，只好停业。

在珠市口路南有一家戏院叫民主剧场，建于 1912 年，是中日两国合资经营的；当初叫开明戏院，造型和外部门脸都依照

外国戏院。京剧名伶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以及号称“评剧皇后”的白玉霜等常在这里演出。擅长昆曲的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寒云偶尔在此票演一场昆曲，观众人山人海，路为之塞。

城东吉祥茶园，位于东安市场北端，是光绪末年内廷大公主府总管事刘燮之出资兴建的，刘交游甚广，他能够约来名望极高的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等艺术大师演出，因此提高了吉祥戏院的声誉。有一次余叔岩在此演出《搜孤救孤》，开演前大雨倾盆，可是场内依然客满。

长安戏院在西长安街，建于 1933 年，为当时北京“道德学会”坛主段谋出资兴建。因地处西单闹市，交通方便，一直是理想的京剧演出场所。

四大名旦的竞争

20年代以后，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曾经开展一场编演新戏的竞争，使京剧舞台五彩缤纷，好戏连台。他们编演的四“红”、四口“剑”等剧目，在社会上广为传诵，使戏迷们大饱眼耳之福。

这四位京剧艺术大师虽然同演旦角，但风格迥然不同：梅派端庄华贵，程派含蓄深沉，尚派婀娜刚健，荀派妩媚活泼；他们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各人独树一帜，互不相让。

这一时期的竞争是以四“红”拉开序幕的。所谓四“红”，是指以“红”字为首的剧目。梅兰芳率先推出《红线盗盒》，接着程砚秋创演了《红佛传》，尚小云创演了《红绡》，荀慧生创演了《红娘》。很快，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红”热。

不久，四大名旦又推出以“剑”字为尾的剧目。梅兰芳演出《一口剑》，程砚秋推出《青霜剑》。在梅、程密锣紧鼓之际，横里杀出尚小云，推出《峨嵋剑》；荀慧生将剑加倍，推出《鸳鸯剑》。这样，四“剑”寒光闪闪，京剧舞台又起高潮。

“剑”热一过，四大名旦又各自演了一出带有旦角“反串”小生行当的戏。梅兰芳首先上演《木兰从军》，程砚秋上演《聂隐娘》，尚小云上演《珍珠衫》，荀慧生上演《荀灌娘》。

当然，四“红”、四口“剑”和四“反串”的相继出现，既

不是偶合，也不是凑趣，而是四位艺术家明显的艺术竞赛。这次竞赛促进了四大名旦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也促进了京剧事业的繁荣。

四大名旦虽然在舞台上互为竞争对手，在台下却是挚友。程砚秋曾师从梅兰芳，所以即使后来成名了，对梅兰芳仍是恭恭敬敬，礼貌有加。而梅兰芳也不以师自居，他钦慕程砚秋在《金锁记》中的表演和唱腔，逢人便说他演这个戏不如程砚秋，并真的放弃了这个戏。尚小云原来的拿手杰作是《楚汉争》，但一俟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出来之后，他自叹弗如，在传授弟子技艺时总是直言劝诫：“这个戏要学梅先生！”

“六五花洞”和“四小名旦”

笔者珍藏了一张六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筱翠花、徐碧云合演《六五花洞》的剧照。过去名演员大都是自己挑大梁，很少合作演出。而“六大名旦”合演，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那是 1927 年至 1928 年间，张作霖在北京任大元帅，有些善于逢迎的督军、总长，为了讨大元帅欢心，准备在他生日时，大摆筵席，大唱堂会，排场要超过历届的总统。而少帅张学良却极为反对这种作风，力劝父亲：

而今中国，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派系战争，老百姓困苦艰难，父亲身为大元帅，一举一动，对部下影响甚大，必须以身作则，不可挥霍浪费。

张作霖接受了这一劝告，立即传话，谢绝庆寿。

但那些发起人却误会了，以为大帅是沽名钓誉，假意推辞；到了那天，仍然按原来的安排办事，仅把庆寿地点由大帅府改在奉天会馆（后改名“哈尔飞戏院”）。

少帅得知后又给父亲出个主意，但暂不声张。当天奉天会馆张灯结彩，宾客满堂，正准备入席的时候，突然接到电话：大帅点名请各发起人到帅府陪大帅叉麻将。直到这时，发起人才悟到马屁拍到了马脚上，急忙撤去筵席，离开会馆，乖乖地陪

大帅搓麻将去了。因为戏已开锣，只好演下去。这出《六五花洞》就是这次特殊堂会的精彩节目之一。

此堂会虽云“六大名旦”，实则被社会选举承认者是“梅、程、荀、尚”四大名旦。继四大名旦之后，青年演员不断涌现。于是，很多热心京剧的观众，倡议选举“四小名旦”。1936年秋，由北京《立言报》主持，专门接待各界投票，结果是：李世芳得票 5800，毛世来得票 5000，张君秋得票 4800，宋德珠得票 3600，分别当选。在“四小名旦”中，李世芳唱作俱佳，有“小梅兰芳”之称；可惜，40年代便已逝世，未能充分施展艺术才华。毛世来深得“花旦大王”筱翠花的真传，擅演《十三妹》等剧。张君秋博采众长，嗓子最好，而今形成了“张派”艺术。宋德珠则以武功及“出手”见长，他的“出手踢枪”别具一格；据报载，他不久前也已病逝。毛世来在东北，年老多病，早已脱离舞台，但仍热心授徒传业。

京剧男女同台之始

1928 年末，位于北京东珠市口的开明戏院，首次男女演员同台演出京剧，开一代风气之先，轰动了九城。

那时在上海，早已有男女同台演出的场面。但在北京、天津等地，却始终被人们认为是“有伤风化”的举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女演员被限定在城南游艺园里演出，更不用说男女同台了。

最后还是京剧艺术大师杨小楼挺身而出，向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组织男女演员同台演出。杨为著名武生，长靠短打，昆乱不挡，技艺超群，在社会上有极高的声誉。杨小楼提交的这张“呈子”，使当时的北京市政府不能不予以考虑。几经周折，终于批准了。

杨小楼邀请了当时京剧界的名伶言菊朋、高维廉、俞麟仙等人，女演员他邀请的是，年仅 18 岁的后起之秀新艳秋。

他们合演的第一出戏是《长坂坡》和《霸王别姬》，剧场是开明戏院。这出戏是杨小楼的拿手戏，过去他与梅兰芳合演。新艳秋曾以一场《骂殿》蜚声京剧界，深得戏剧家齐如山的赏识，是王瑶卿的入室弟子。在上演之前，她先到王瑶卿家里求教，王花了很长时间给她说了一遍《长坂坡》。而后她又求教于梅兰芳，梅更是热情帮助。新艳秋学得了王瑶卿的一手绝活——糜夫人

投井时抓披的一个身段；梅兰芳又把全部《别姬》本子交给她，待她背熟全部台词之后，再给她把身段表情，一一讲明。

经过王、梅二位的指点，新艳秋还不放心，便直接求教于杨小楼。那时杨小楼住在大栅栏内扫帚胡同，平时不大出门，少言寡语，家里供奉着一尊佛像，燃着一炉香，常常一个人静静地打坐。杨小楼给新艳秋指点了《霸王别姬》中的几个身段。

经过一番准备，开明戏院出现了北京第一次男女演员同台合演京剧的场面。戏院里座无虚席，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也前去观看。打炮戏是杨小楼与新艳秋合演的《别姬》，一炮打响，赢得了满场喝彩。散戏后，杨小楼在后台拍着新艳秋的肩膀说：“今天我演得很顺手。”

“钟馗戏”追忆

顷闻，女武生裴艳玲将率河北梆子剧院赴日本演出一个月，只演《钟馗》一剧；不禁联想到她曾在北京演出时的盛况，从而引起我对“钟馗戏”的追忆。

“钟馗戏”源于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事出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相传唐明皇李隆基卧病在床，晚间梦见一大鬼捉一小鬼啖之，甚惊异，遂问其故。大鬼曰：“在下钟馗，生前曾应武举未中，死后决心消灭天下妖孽。”明皇醒后，将梦境绘声绘色地学说一遍，命画工吴道子绘成图像。从那时起，民间不仅出现了钟馗画像，而且有“钟馗嫁妹”的故事，后又由故事演变成《钟馗嫁妹》这出戏。

《嫁妹》中的钟馗，花脸扮，端肩、腆胸、撅臀，形如丑鬼，却给人以美感，因为他心地善良，刚正不阿。“端肩”实为表现钟馗“缩脖”；相传那是他应试未中，一气之下撞铜柱而死，所以脑袋缩进了脖项。

最早的《钟馗嫁妹》戏，名叫《闹钟馗》，是近代京剧名伶何桂山的代表作，出自《孤本元明杂剧》和张心其著《天下乐》传奇。“嫁妹”戏较之“嫁妹”传说，有了更完美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剧写终南山进士钟馗与同乡杜平入都应试；钟馗因应试未中，愤而撞柱自杀，天帝封之为斩妖之神。钟

馗因感杜平为其埋骨之义，乃归家，以妹嫁杜，并率鬼卒送往杜家。花脸扮钟馗角色，可充分展现演员的功架、造型和唱腔。多年来京剧、昆曲、川剧、滇剧、同州梆子，都上演此剧目。

早年唱“钟馗戏”最有名的当属昆曲名伶侯玉山先生。侯玉山从二三十年代就演《嫁妹》，在京、津、沪红极一时，人称“活钟馗”。50年代他年逾花甲，仍登台不辍，可见功夫之深。稍后一些的是尚小云之子尚长春和“厉家班”的厉慧良，他二人都是京剧武生，40年代常演《嫁妹》，功架和造型都很讲究。

到五六十年代，“钟馗戏”因有“鬼戏”之嫌，曾一度停演。而今裴艳玲小姐演出全部《钟馗》，颇有新意。她前半部戏俊扮小生行当却以老生应工，后半部戏扮花脸，堪称“钟馗戏”的一个创举了。

《大劈棺》和《纺棉花》

《大劈棺》与《纺棉花》这两出京剧，在 40 年代的平、津、沪等大城市的戏曲舞台上，曾经风靡了许多观众。

《大劈棺》里的田氏与《纺棉花》里的王氏，都由旦角女演员饰演，所以当时的观众或戏剧报刊咸以“劈纺坤伶”称之。

京剧《大劈棺》又名《蝴蝶梦》；它取材于《警世通言》卷二，及《今古奇观》第二十回《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弋腔、秦腔、徽剧均有《蝴蝶梦》，河北梆子有《庄子扇坟》，而川剧则有《南华堂》，故事情节大同小异。

故事描述的是：庄周得道，路遇新孀扇坟，盼土快干，以便改嫁。庄周因此回家试探妻子田氏。他伪装病死；成殓后，却幻化为楚王孙，携一书童来吊唁。田氏见王孙英俊年少，顿生爱慕之心，拟嫁之。洞房中王孙假装头痛，谓死人脑髓可治，田氏乃劈棺取庄周之脑。庄周突然跃起，责骂田氏。田氏羞愧无地自容，终致自戕而死；庄周亦弃家而走。戏中田氏多由花旦行当中的“刺杀旦”应之，因剧中表现田氏见庄周从棺中跃起之惊吓状，有许多扑跌身段。按旧日的表演而论，田氏与《战宛城》的邹氏、《乌龙院》的阎惜姣、《翠屏山》的潘巧云、《挑帘裁衣》的潘金莲均属于“刺杀旦”一类的角色。

《纺棉花》的剧情是：有银客张三者，离家出外经商，3年

未归。其妻王氏思夫，于纺棉花时歌小曲自遣。适张三归来，在门外窃听，又抛银试之，妻为所动，开门，夫妻相会。

这出戏故事情节很简单：演者著时装旗袍，高跟皮鞋，浓妆艳抹，在舞台上以唱时代流行歌曲为炫耀（如电影《万世流芳》中的插曲《卖糖歌》、《戒烟歌》等）专迎合小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

40年代予居北平时，京剧界坤伶咸以演《大劈棺》、《纺棉花》为招徕。当时上海报刊发表署名文章，以《歌场新咏》为题，写梨园打油诗六首，其中一首是咏《纺棉花》的。诗云：

棉花纺得软绵绵，
究竟坤伶玩艺鲜。
还有“劈棺”拿手戏，
斧头劈出大洋钱。

30多年来，因《大劈棺》宣扬封建迷信，并有色情台词及表演，大陆一直未曾演出。近闻昔有“劈纺花旦”之称的童芷苓，在上海将《蝴蝶梦》改编试演，大概会有所创新，但愿将来能一饱眼福。

“票友”与“票房”

40年代，北京西单商场楼上有一家“票房”，名叫“桃李园”，它是当年北京的票友经常“消遣”的场所；梅派青衣梁忆梅和曾任中国京剧院琴师的黄金陆，过去都是这家票房的常客。

“票友”这个名称究竟怎样来的，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清朝雍正年间，清兵与中国西北地区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的回族作战，为了鼓舞士气，在军营中编写了太平鼓词，命八旗子弟在军内传唱，并奖之以“龙票”，遂称演唱太平鼓词的这批八旗子弟为“票友”。因八旗子弟演唱均属尽义务，不另付报酬，后来就把一些业余唱京剧（不拿酬劳）的人，称之为“票友”。

另一种说法是：清代道光年间，朝廷为了防止旗籍士兵进民间戏园看戏，专设一种只唱太平鼓词一类的娱乐场所，凡旗籍士兵均发给免费入场票券一张。久之，在这批旗籍士兵中出现了一些业余戏曲爱好者，人们遂称其为“票友”。

供“票友”演唱活动的场所，名为“票房”。“票房”是随着京剧业余爱好者的增多而出现的。清光绪年间，随着京剧的广泛流传，“票房”也随之增多。当时北京四城均有“票房”例如西城的“松筠庵票房”，地安门大街的“南月牙票房”等。其中历史最久、名声最著者，当数同治末年创立的“翠峰庵票